

民族史译文集

11



·一九八三年·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民族史译文集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
一九八四年

目 录

编者前言

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

往的俄国档案文献……………В.Л.科特维奇 著
李佩娟 译 (1)

《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绪论

(附档案文献目录)……………И.Я.兹拉特金 著
李琪 译 李佩娟 校 (56)

《俄蒙关系史料(1636—1654)》绪论

(附档案文献目录)
……………М.И.戈利曼、Г.И.斯列萨尔丘克 著
李琪 译 齐力 校 (74)

十七世纪三十一—五十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

案资料……………М.И.戈利曼、Г.И.斯列萨尔丘克 著
李佩娟 译 (92)

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И.Я.兹拉特金 著

李琪 译 王嘉琳 校 (108)

苏联史学界利用俄国档案研究准噶尔史述评……………马大正 (130)

(附苏联有关准噶尔历史的著述目录〔1949—1980〕)

附：本集译文人名、地名、书名译名对照表…………… (147)

第12期目录预告…………… (107)

编者前言

苏联史学界对有关准噶尔历史的俄国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一直为我国民族史研究工作者所关注。收入本集的译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从不同的角度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准噶尔历史的俄国档案文献的内容，并介绍了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历史和概况。这一类收入三篇译文：（1）《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2）《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绪论（附档案文献目录）；（3）《俄蒙关系史料（1636—1654）》绪论（附档案文献目录）。第二类是利用俄国档案进行专题研究的较有份量的两篇论文，由此可概略了解苏联史学界研究准噶尔问题的观点、深度、侧重点及动向。这两篇论文是：（1）《十七世纪三十一—五十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2）《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此外，本集刊登的《苏联史学界利用俄国档案研究准噶尔史述评》一文，对苏俄利用档案进行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述评，并附有1949—1980年苏联有关准噶尔历史的著述目录，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线索。

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与 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

(1919年4月2日由С.Ф.奥登堡院士
提交历史学科与语文学学部会议)

В.И.科特维奇 著

李佩娟 译

—

俄国人在向西伯利亚推进并在那里确立自己的统治时，不但要战胜来自各地诸部落——沃古尔人*、鞑靼人、奥斯恰克人**、萨莫耶德人***、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等——的反抗，同时要迎面遇到自亚洲大陆腹地掀起的两股浪潮：在前西伯利亚遇到卫拉特诸部自西部蒙古向外移动，在远东遇到以满洲人为代表的中原新的征服者自满洲和中国向外扩展。这两股在我们看来已达到很可观程度的浪潮，阻碍了我们向东方的前进，并使我们与朝我们方向移动的诸民族发生了多种形式的关系，有时是敌对关系，但大多数是和平关系，与这些民族的交往是通过使团活跃起来的。这些使团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调解各种争执，而且也是为了探求建立牢固的睦邻关系的基础。

如果说我们和满洲人比较迅速地确立了条约关系，那么和卫拉特人的相互关系却依然悬而未决，虽然和后者交往比起和满洲人要早得多，尽管两方面都作了种种试探，我们也未能用正式文件划分势力范围。俄国政府虽很重视自己与满洲人达成的协定，但更看到满洲人是如何镇压卫拉特人的，是如何通过征服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来完成其征讨计划的。一股浪潮扑向另一股浪潮，如此不断推进，辗转到了俄国国境。俄国的中亚一带这才与满洲强国（过去称为中华帝国是不确切的）为邻了。

卫拉特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及其与近邻的相互关系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是阐明这一包括一百五十多年的时期的史料，不仅还未被利用，而且连应该查明的还尚未查

* 分布于乌拉尔山岭北部。——译者

** 即汉提人（ханты）。——译者

*** 即涅涅茨人（ненцы）。——译者

明。这一时期的前半期材料特别贫乏，因而在许多方面情况不明。

在卫拉特人所在地，我们只了解到有关他们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很少的生活情况。毫无疑问，他们有过历史文献，但由于他们所经历的变化无常的命运，不利于文献的保存，因而现在只能根据少数事实来判断其发展的程度。

首先可以肯定，卫拉特人有过各部王公的详细系谱。王公中许多人在与满洲人的战争时期丧生^[2]，卫拉特诸氏族整个地遭到满洲人的杀戮；可是不少系谱记载仍然完整无缺。其中一部分落入了满洲人手中，被送往京师用于记述与卫拉特人的战争^[3]；另一部分保存在卫拉特诸部手上，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那里也有，被用于下面要讲到的卡尔梅克史学家加 班 沙拉布和巴图尔乌 布什 丘 缅的一些著作。此外，王公系谱也流入了俄国人之手，这部分系谱是经常要研究卡尔梅克王公相互之间亲属关系的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找到的，并从阿斯特拉罕档案馆（也有一部分直接从卡尔梅克人那里）转入学者手中。П. И. 雷奇科夫发表简短的系谱资料已是1762年的事了^[4]，而后在1776年，П. С. 帕拉斯根据俄国书面档案文献和卡尔梅克史料出版了详细的系谱^[5]。此外，在1829年，雅金夫*从中国地理辞书《西域同文志》中摘录了卫拉特的系谱^[6]。系谱的欧洲诸语言文本也保存于我们的古代文献保管库：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7]和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馆^[8]。

后来，帕拉斯在引用从卡尔梅克人那里获得的资料时，谈到卫拉特人有历史纪事，各个部落都有这样的纪事，其名称是 chondschin Täkkä^[9]。顺便提一下，据渥巴锡汗逃跑后留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准噶尔人的叙述，准噶尔著名统治者巴图尔浑台台（1634—1653）曾下令编撰详细的年代纪；后来，他的历任继承人也继续编撰^[10]，可见，这是准噶尔部的官方编写的历史。遗憾的是，帕拉斯好象未能见到这些年代记（除加 班 一 沙拉布著作之外），就是近年来的研究者对它也仍然是个谜。

关于卫拉特人上述历史著述的性质，可以根据下列流传至今的古文献得出若干概念：

（一）卫拉特著名佛教传播者与启蒙家咱雅班第达（1599——1662）传 我们从传记中了解到整个十七世纪（到1711年止）卫拉特人的简史。该传记的一些文本存于彼得格勒各图书馆中^[11]，俄国蒙古学家А. 波波夫、Ю. 雷特金、К. 戈尔斯童斯基和А. 波兹涅涅耶夫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利用过这部传记。这部古文献的全文至今未予刊布，在出版物中所见的是卡尔梅克文和译文的短篇摘录^[12]。

（二）土尔扈特诺颜出身的格隆（医生）加 班 沙 拉 布 编撰的卫拉特历史 关于这部历史和它总的內容，还在1776年就已由帕拉斯加以报导^[13]，但也至今未予刊布，文献中所见到的只是从中摘录的引文。这部历史有几种抄本，在彼得格勒几家图书馆和一些私人的手上均有，除卡尔梅克文外，还有蒙古文本^[14]。这部历史是1737年编撰的。^[15]

（三）加 班 沙 拉 布 的著作似是其后一部题为《杜尔本—卫拉特人的传说》（Дөр-бөн ојирадјијн тўке）的名著的蓝本和所依据的史料之一，该名著是和硕特诺颜巴图尔乌 布什 丘 缅于1819——1820年所编写。这两部著作的最重要部分都是系谱这一部分；加 班 沙 拉 布 的著作中列了土尔扈特、和硕特和杜尔伯特王公的系谱，而丘 缅的著

* 即比丘林（Бичурин）。——译者

作还有辉特和准噶尔王公的系谱。《传说》的译本还在1859——1860年就由雷特金出版^[16]，而卡尔梅克原文起初由A.波波夫刊布了一部分^[17]，后来由波兹德涅耶夫全文刊布^[18]。

(四) 关于蒙古乌巴什琿台吉* 征讨卫拉特人的历史传说 这部传说为加班一沙拉布和巴图尔乌巴什的著作增添了若干内容。它记叙了蒙古人一方面和乌梁海人，另一方面又和卫拉特人激战的史实，还说明了十六世纪末叶卫拉特人移居的地区；除此之外，它以歌颂英雄的笔调描述了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卫拉特活动家^[19]。传说刊布过若干次：A.波波夫刊布的是片断^[20]，嘎勒桑高姆色耶布喇嘛^[21]和戈尔斯童斯基刊布的是全文^[22]。彼得格勒大学图书馆存有这部传说从卡尔梅克语转译为蒙古语的复述本^[23]。

(五) 《卡尔梅克诸汗简史》(халимак хэдијин түүндјиги хурāпи бичиксеп тоб-чи) 作者不详，由雷特金出版该著的译文(附注释)^[24]，由波兹德涅耶夫刊布原文(全文)^[25]。这部史略包括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自准噶尔出走到大部分返回(1771年)的这段历史。

在历史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古文献还有下面两部著作。

(六) 铁龙年(1640年)卫拉特和蒙古诸王公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法规和噶尔丹琿台吉后来对该法规所拟定的两件补充法规 流传至今的只有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保存的卡尔梅克文本^[26]。据俄国档案资料^[27]所记，设在卡尔梅克汗帐附近的的札尔固** 帐幕内保存了一份各种法规的完整文本，书写在带花纹的白缎上，但在卡尔梅克人内讧时丢失；据敦多克达什说，他不得不亲自在草原上到处寻找法规的抄件。在这个时期(十八世纪上半叶)，俄国人也必须了解法规的内容，于是，一份已经不完全的法规抄件落入了当时精通卡尔梅克语和卡尔梅克一般事务的瓦西里·巴库宁手中；关于法规俄文译本的记载也是在这个时代^[28]。起初，由A.波波夫根据一份佚名抄本摘录了1640年法规前面的一小部分，刊布于1847年^[29]；以后，大家又认为卡尔梅克文本已失落，到戈尔斯童斯基在卡尔梅克草原上找到了1640年法规和以后的法令的两份抄本后，才不这样看。在上面提到的戈尔斯童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规》一著中，以其中的一份抄本^[30]为依据刊布了法规^[31]。对存于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馆^[32]、彼得格勒大学图书馆^[33]和亚洲博物馆^[34]的法规抄本，刊布法规的戈尔斯童斯基似乎并不清楚；此外，他根据所掌握的卡尔梅克正字法^[35]，又对他所利用的唯一的一份手稿的正字法作了修改，但未作专门说明。现在所知道的五种抄本可分为两类：一类(两种抄本)除了1640年法规之外只有噶尔丹的第一项敕令；另一类(三种抄本)除上述内容，尚有噶尔丹的第二项敕令和敦多克达什的法规(有一份抄本还有以后适用于当地法令)。在两种抄本中写有特殊的祷词作结语，刊载于噶尔丹的第一项敕令之后^[36]。从各种抄本的法规原文本身来看，几乎完全相同。

至于法规的译本，如果A.波波夫刊布的短篇摘录的译文不计在内，则有三种印本：(1) 噶尔丹策凌(1727——1745年)时代的最早的一份俄文印本(1640年法规和噶尔丹的第一项敕令)，存于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馆；根据П.舍列麦捷夫伯爵抄本刊

* 即札萨克图汗和托辉特部硕垒。——译者

** Запро, 指法院。——译者

载于1776年《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自由协会试刊》和1828年《北方档案》（《祖国之子》）上的俄文译文以及Ф. И. 列昂托维奇于1879和1880年出版的俄文译本均源于这份最早的印本；（2）帕拉斯于1776年出版的德文简印本（1640年法规，噶尔丹的两项敕令和敦多克达什法规）；（3）戈尔斯童斯基所完成的最新译本（包括的内容同上）。

该古文献鲜明地反映出十七世纪卫拉特人的习俗，引起了许多作者的注意，而且还从法律和历史方面对它作广泛的探索（如Ф. И. 列昂托维奇的著作），但对它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不充分的^[37]。

（七）准噶尔地图，或者说得确切些，卫拉特国地图 它是瑞典人雷纳特于1733年自该国取来的，最初被认为是雷纳特本人用瑞典文绘制的。1881年，我国地理学会根据1738年复制的、1879年斯特林贝格在林彻平皇家图书馆发现的那件复制本所出版的，就是上面这张地图^[38]。然而，过了十年之后，这位斯特林贝格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又找到了两张卡尔梅克文地图，其中一张正好与已出版的瑞典文地图相同。因这一发现，A. 马克舍耶夫和波兹德涅耶夫在肯定雷纳特的一小部分作用时^[39]，认为卡尔梅克文地图才是原件；但是他们在说出自己的看法时不是很坚决的，因而，地图仍被认为是雷纳特所绘制的^[40]。

在亚洲博物馆还保存一份手稿（编号Ⅲ，186），似列入巴依耶尔档案中，是加麦利院士1845或1846年在国外得到的。在这份手稿中有一篇的标题是“Geographia Calmucica ex Mappa ditionum Calmucicarum quam Academia a Joanne Renato ipse a Galdan Sirin Calmucorum Songar Principe impetrauit. Accedunt Secretarii Pakunin relationes de quibusdam harum urbium earumque statu”，这一篇列举了卡尔梅克文地图中用拉丁文转写的卡尔梅克名称（这种转写与现有的瑞典文本并不相同），提供了雷纳特向巴依耶尔口述的各种资料。因此，雷纳特地图的经过可描述如下：雷纳特从噶尔丹策凌处得到其领地的卡尔梅克文地图，1734年路过彼得格勒时拿出来给有兴趣的人观看，后来又告诉了科学院（可能用的是复制件）；就在那时又对卡尔梅克名称标注了拉丁拼音，可能是在上面提到的瓦西利·巴库宁参加下进行的。结果，这张地图在科学院无踪无影^[41]，因此就可作如下的推测：地图本身的复制件和拉丁转写本落入了巴依耶尔院士手上，并被带到国外，而从国外送回亚洲博物馆的只是转写本。雷纳特在被俘期间或者说在回到瑞典后，根据卡尔梅克文地图仿制了与卡尔梅克文原件相同的瑞典文草图；1879年，在斯德哥尔摩发现的就是这份草图的复制件，后在圣彼得堡出版；但是，雷纳特后来又绘制了卫拉特诸领地的更完善的瑞典文地图，这张图也是斯特林贝格在乌普萨拉找到的，现存于俄国地理学会图书馆的是照片（编号为Ⅲ 6. $\frac{12}{27,28}$ ）。较为

复杂的问题是，卫拉特人在绘编上述两张卡尔梅克文地图时使用的是什么史料，这个问题目前只能是个悬案，虽然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绘图学，似乎还不能对此有怀疑。

上面列举的古文献表明，卫拉特人拥有的历史文献是各种各样的，但在确凿的历史材料方面，除了世系表和法规文本外，这些古文献突出表现为内容很贫乏，因而要阐明本文研究的卫拉特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要求助于曾和卫拉特人发生过接触的民族即俄罗斯、汉、满、蒙古和穆斯林那里所保存的史料。

现在从穆斯林谈起。卫拉特人在将其统治扩展至西蒙古境外时，占领了东突厥斯坦，多次和希瓦、布哈拉以及游牧各部——哈萨克、吉尔吉斯、诺盖及巴什基尔人——发生接触；于是这种接触在穆斯林作者的笔下留下了它的痕迹，其中，从十七世纪起至后来的这一时期可列举如下：

(一) 玛哈木特·本·瓦里的著作《历史文献录——赠友人》，其中叙述了1636年以前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件。

(二) 佚名著作（亚洲博物馆手稿，编号590 0i），叙述同一地区的事件，到十八世纪初叶止。

这两件史料的内容最初是由B·B·巴托尔德在其1902年《赴突厥斯坦的出差报告》一文中报导的。他主要以这两件史料和下面一部著作《和卓传》为依据，在文中详述了喀什噶尔十六世纪下半叶和十七世纪的历史和卫拉特人在该地所起的作用^[42]；M·哈特曼翻印了这些记载（略加删节），并加上了自己的注释^[43]。

(三) 《和卓传》* 该著由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于1768——1769年写成^[44]。许多作者都用这部著作来阐述东突厥斯坦近代的事件，虽然他们对前人的著作并不都是很注意的。乔坎·瓦利哈诺夫在其关于1858——1859年去上述地区的报告中引用过这部著作，但未说明资料来源^[45]；后来，H. B. 维利亚米诺夫—泽尔诺夫写了详细的节录本，并附原件的引文，只是他的著作并未问诸于世^[46]；以后，R. B. 沙散写了简略的节录本，在他身后才出版，并附N·伊莱亚斯的注释^[47]；此外，M·哈特曼所作的精细叙述（几乎是翻译），使我们深受其益^[48]。如上所述，巴托尔德也采用了穆罕默德—萨迪克著作的某些记载。

(四) 奥斯曼作者塞菲的著作*** 其中涉及卫拉特人的片断，作为附录载于舍菲尔所译的阿卜杜尔·凯里姆·布哈里著作的法文译本^[49]，后来，巴托尔德在其《七河流域史纲》中也使用过这部著作^[50]。

(五) 《安宁史》 毛拉·穆沙·本·毛拉·艾沙于1903年编撰，由H. H. 潘图索夫刊布原文，无译文和任何注解^[51]。巴托尔德分析研究了这部包括近期在内的喀什噶尔历史的著作^[52]。

(六) 阿布加齐的名著《突厥系谱》是一部关于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于1665年成书，对卫拉特人和希瓦的冲突提供了若干资料。作者在登上希瓦王位之前曾在卫拉特统治者（可能是巴图尔浑台吉）那里留居整整一年（大概在1642——1643年），精细地研究了卫拉特的语言和风俗，但是后来，他不得和他们发生武装冲突^[53]。该著简要地指出了卫拉特人在希瓦出现的最早时间是在“乌兹别克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这是值

* 本著汉译文见《民族史译文集》第8期第53——136页。——译者

** 作者是十八世纪我国新疆维吾尔族。——译者

*** 于1582年成书，世人只知有一份手稿存于莱顿大学图书馆，编号为手稿N0917。——译者

得重视的。根据作者的说明，这件事应该是在十七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大约是在1604年^[54]。

穆斯林作者有关卫拉特人的记载，总的说来提供的资料很少；十八世纪最初二十五年，在西伯利亚当俘虏的瑞典军官们和1733—1743年留在西伯利亚的Г. Ф. 米勒，都来自东突厥斯坦的人们即所谓“布哈拉人”那里以盘问的方式收集了一些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穆斯林作者的记载^[55]。

极为珍贵的是中国发表的汉文和满文资料。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翻印了涉及满清活动的官方文献这类书刊，其中主要是翻印了涉及各方面事务的圣旨奏折，也包括卫拉特事务在内（甚至有的纯属是谈卫拉特事务的）。诸如以下的多卷籍：

（一）《东华录》——官方文献汇编，各朝文献按编年体排列。据所知，该著作有两个版本：一为蒋良骥所编的版本，篇幅较短，叙述的事件到1735年为止；另一为王先谦所编的版本，篇幅较长，到1874年为止。第二个版本可以称为清朝的编年史^[56]。M. 库朗在其博士答辩论文中使用了这部编年史上关于卫拉特的材料^[57]，而柔克义则使用了其中谈及西藏、满洲人和蒙古人（卫拉特人）之间关系的材料^[58]。

（二）《圣训》——官方文献汇编，它与前面那部著作不同，按纪传体排列，有两部版本问世：一为汉文本，名《圣训》；另一为满文本，名为《ендуриге гачихијан》。该著按朝代汇编而成——从太祖朝创始人（努尔哈赤）到同治朝在内；此外，另有两部汇编：一为自太祖至雍正的最早的五位帝王，另一为太祖、太宗和顺治这三位最早的帝王。八十年代时，私人出版了汉文本，计250卷，包括太祖至同治在内的历代帝王的圣谕^[59]。

（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关于康熙朝在北蒙古和西蒙古的军事行动的官方文献汇编，于1709年刊印。这是一部阐述满洲人军事行动的长篇多卷集，用的是这类多卷集千篇一律的名称：《钦定平（剿）定……方略》，由专门委员会即方略馆刊印，而且除了汉文本外，同时还有满文本^[60]。上述多卷集的满文本的标题是：《（беје дай-иламе）варги амарги бабе нечихіјеме токтобуха бодогон-і бітхе》，早在1749—50年就已由罗索兴准尉为我国科学院译出，他称这部著作作为《中国康熙皇帝征服大鞑靼境内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蒙古五卷史》^[61]。然而，这部译著始终没有出版；到了1777年，出现了一本由“秘书官”Ал. 列昂节夫编撰的该著的节录本，题为《有关中国人与准噶尔人1677—1689年战争的资料汇编》^[62]。穆瓦里阿·德·梅拉的《中国通史》第11卷第1册是以《平定朔漠方略》为基础写成的；该著于1780年问世^[63]，记述了满洲人和卫拉特人的战争史。此外，波兹德涅耶夫在刊布涉猎康熙朝与雍正朝满洲人和卫拉特人交战的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时，也使用了该著的满文本^[64]。

（四）《平定准噶尔方略》（满文为：пунгар-і бабе нечихіјеме токтобуха бодогон-і бітхе）——同样性质的一部文献汇编（但内容丰富得多），有汉文本与满文本，记载乾隆朝满洲人征讨卫拉特人（准噶尔部）的历次军事行动^[65]，1770年出版。汉尼什从该著的满文本摘录了征服西藏的资料，而且在他的著文中也有卫拉特人与上述西藏地区的关系的材料^[66]。

（五）《外藩蒙古（也包括卫拉特——本文作者）回部王公表传》——官方编撰，内有许多文献，均全文发表。《表传》及续修一式三种文本：汉文本，称为《表传》，

满文本——《илетун улабун》；蒙文本——《илетхел шастир》。波兹德涅耶夫刊印的《宝贝念珠》中注释的主要史料之一就是这部表传^[67]。

(六) 关于为满清建立过功勋的国家活动者的另一些官方或半官方传记汇编中，可借鉴的还有一些资料，但对研究卫拉特历史已不是那么重要。现列举如下：

(1) 《宗室王公表传》(Уксун і ван гун саі гунге фашан бе илетулере улабун)，有汉文本和满文本；

(2) 《满洲名臣传》；

(3) 《汉名臣传》^[68]。

所遗碑铭对以上列举的汉、满文献的内容有所增补。康熙与乾隆皇帝认为征讨卫拉特人的军事行动有重要意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为纪念自己的胜利战果，立了碑铭，刻上有关内容的碑文。康熙粉碎噶尔丹后，1696年在克鲁伦河附近拖诺山、图拉河流域昭莫多地方和东蒙古的察罕七罗山^[69]立碑；1697年又在南蒙古的狼居背山和北京的太学立碑^[70]，但是这些碑铭始终没有找到。1755和1758年乾隆在热河(承德府)立了两块碑铭，颂扬征讨卫拉特人的胜利，1771年又立了两块碑铭，纪念部分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自俄国返回准噶尔。乾隆立碑后不久，由于一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钱德明(Amyot)的努力，此事就为欧洲所知。他在《中国论丛》(巴黎，1776年)第1卷中登载了1758年^[71]和1771年^[72]碑铭的汉文碑文的译文，并附大量注释。B. 劳费尔于1901—1904年去中国考察期间找到了热河四块碑铭的全部拓片(1755和1758年的碑铭——汉、满、藏与卡尔梅克文拓片；1771年的碑铭——汉、满、蒙、藏文拓片)；1914年，这些碑文出现在O. 弗兰克和B. 劳费尔所著的《中国碑铭集》这部精致的图集上，载于该集第1册《北京、热河和西安的喇嘛寺碑文》(汉堡，1914年，附卷末两个)^[73]。

其次是个人写的笔记。他们或是直接参与与卫拉特人有关的事件，或是从事件参加者那里得到有关这些事件的资料。

《圣武记》一著载有四个人物记下的珍贵笔记，即钱良择、马思哈、殷化行和于成龙，他们于1688，1690和1696年参加了满清军队北上至关外的远征，其中马思哈作为一名军事将领在这些事件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这些日记的译文附在波兹德涅耶夫《宝贝念珠》一著的后面^[74]。在波塔宁的《西北蒙古概论》中，也刊载了马思哈日记，约有一半为B. II. 瓦西里耶夫所译，与上面所译的有所不同^[75]。

范昭遼日记*由П. С. 波波夫所译。范昭遼曾参加1720年组织的考察队，目的是建立由呼和浩特到科布多之间的驿站，以适应征讨卫拉特汗策妄阿拉布坦的军事行动。日记涉及的面虽很广泛，但历史材料很少^[76]。

《异域录》是很引人注目的，它记述了远方各地的情况。这是康熙皇帝于1712—1714年为解决同俄国和卫拉特人的关系而派往卡尔梅克汗阿玉奇处的使团成员、满清官员图理琛的旅途记述。这部著作于1723年同时刊印了满文本与汉文本，多次被译成欧洲各种语言，俄语就有两个译本，由罗索兴和列昂节夫译自满文本^[77]。

参加过中国满清统治者一方活动的欧洲人写下的记事，对列举的这一组汉文史料作

* 即《从西纪略》。——译者

了重要补充，特别是耶苏会士张诚的行纪更是如此，他在满清讨伐卫拉特人的军事行动中屡次（1691，1696和1697年）作为康熙的一名随员去过蒙古^[78]。

1712—1714年随图理琛使团同行的瑞典大尉施尼策尔（Jo. Christ. Schnitscher）写过一本小册子《论阿玉奇部卡尔梅克人之起源和投向俄国的经过》（斯德哥尔摩，1744年，附雷纳特注释），该著没有多大价值。这本小册子不久就由科学院翻译费尔克纳译成德语，但该译本当时并未出版^[79]，后由米勒将其刊载在1760年出版的《俄国史集》第四卷，略作校勘，并附内容相当丰富的注释^[80]。

随着卫拉特强国的覆灭，在中国提出了全面研究被征服土地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的问题。这两个地方连同西突厥斯坦以及毗邻地区，过去在中国文献中通常称之为西域，而现在则称为新疆。从事研究的不仅有北京政府，同时还有一些私人。在事态激化后立即就地进行的大规模工作，为收集珍贵的史料性资料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在十八世纪就在中国出现了一批描写当时的西域状况和叙述以卫拉特惨败告终的事件进程的著作^[81]。

（1）1756年，乾隆皇帝就颁发了撰写西域史的命令，该著初稿用了五年时间，到1782年才完成校订刊印，定名为《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诸如东突厥斯坦征服者兆惠、傅恒等大臣都参加了该著的编撰工作。这部巨著共48卷，卷首部分不计在内。许多汉文著作例如大清帝国第二部官方地理书籍（《大清一统志》）及以后的书籍都以它为原始资料；但是，由于该著不多见，欧洲人知道的很少。B. B. 格里戈里耶夫根据И. И. 扎哈罗夫的口述，又据圣彼得堡所藏的若干文本，最早提供了有关该著的相当详细的情况^[82]。西欧的汉学家到现在才拥有这部著作。殷宝哈（Cam. Imbault-Huart）先利用了该著的材料，在其《中亚文献汇编》^[83]中概述了《西域图志》的内容，刊载了其中的一张地图和涉及西域某些国家与民族的节录译文；后来，沙畹在其论述西突厥与中亚汉文碑铭的专著中也利用了该著的材料^[84]。

《西域图志》的作者们利用了以前有关西域的文献记载和专门考察队新收集的资料（1756年以何国宗为首的准噶尔考察队和1759年以明安图为首的东突厥斯坦考察队），其中还包括耶苏会士对天文进行考察的记载^[85]。

《西域图志》内有许多绘图。

（2）1763年，乾隆敕令傅恒用各种语言编撰西域的历史—地理术语词典，由此才出现了汉文本《钦定西域同文志》一著（8本，24卷），书中对所解释的术语附有满语、蒙古语、藏语、卫拉特语（卡尔梅克语）和察合台语的注音。对于这部珍贵著作的编撰方法或刊印时间，书中未加任何说明。所解释的术语数目，计3111条^[86]。这也是稀有的书籍，在西欧似乎只得到了一部^[87]。克拉普罗特用德文节译了一部分，摘要了一部分，但该著未出版，手稿今在国立巴黎图书馆^[88]。上面已提到，雅金夫从《西域同文志》摘录了卫拉特王公以及东突厥斯坦察合台与和卓的世系表^[89]；殷宝哈又重译了和卓的世系表^[90]。

（3）《回疆志》——主要从地理、民族学方面记述东突厥斯坦，附地图和服装插画。满族官员苏尔德和福森布撰写。成书时间，H. A. 贾尔斯认为是在1768年，而B. П. 瓦西里耶夫则认为在1772年左右。从手稿存本^[91]来看，而且仅从莫斯科鲁缅佐夫博物馆K. 斯卡奇科夫汉满藏书的手稿本目录（存书部，№435），就可知道，确有

1772年的刊印本。

(4) 有一位满族写的著作,无论在中国或是在欧洲,都享有盛名。有一些作者(利波夫佐夫、列昂节夫斯基、Al. 威利、P. G. v. 默伦多夫、R. K. 道格拉斯、中国的评论家何秋涛、日本的中国书籍丛书(汉籍题解)、扫叶山房)称他为七十一(利波夫佐夫称他为七十一公),另一些作者(H. 贾尔斯、Ch. 登比、M. 库朗、沙畹)则称他为椿园,有时可能对这是否是同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发生过怀疑。在汉籍中,叫法各异:椿园、椿园氏、满族七十一、七十一、椿园七十一、长白七十一椿园。沙畹对七十一作了试释,认为这表示他撰书时的年龄^[92];可是,他对这问题研究得不够全面,因为也有可能七十一只是满文名字的转音而已(作者是长白山氏满族)^[93]。

与该作者有关的另一个情况,也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写过几篇短小的论著和一篇前言(后者写于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这几篇刊印过若干次,以文集的形式编撰,编法各异,书名也不一;而且,有时由于对论著本身作了重要的修改,因而篇名也各异。要说清楚这里所涉及的全部问题之所以困难,据我们所知,是因为上述文集没有一个欧洲图书馆是蒐集齐全的。

在彼得格勒有四本文集,其中的《西域闻见录》和《新疆外蕃纪略》同《异域琐谈》和《西域总志》几乎是一样的^[94]。这几本文集都收集了椿园以下五篇论著:《新疆纪略》(或《新疆列传》)、《外蕃纪略》(《外蕃列传》)、《西陲纪事本末》(《西陲总叙》、《叛亡纪略》)、《回疆风土》(《朔方风土》)、《新疆道里表》。

欧洲学者最常用的是《西域闻见录》,书名本身就指明了椿园著作的性质;他在该著中记载了自己在当地观察调查的结果。该文集最早的节录本由C. 利波夫佐夫完成,刊于1820—1823年的《西伯利亚通报》^[95];1829年,雅金夫在其《准噶尔与东突厥斯坦古今记》的第2册刊载了该文集的全部译文(见第85—240页),并指明另有满文译文^[97]。

(5) Чжи-и синь-бянь(?)——对西域作了简述,其中包括东突厥斯坦和准噶尔^[98],1794年刊印。

(6) 《西域地名考》——考证西域地名。手稿^[99]。

(7) 《新疆舆图风土考》——研究新疆的特色和地理。刊印于1774年^[100]。

由于西陲不时发生骚动,所以在十九世纪时,中国仍很注意这一地区;并可举出这一时期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其中一部分以当地收集的情况为依据,一部分则以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在这些著作(其中有些是著名学者所写)中,对该地区过去的记述占有显著的地位。

(1)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著名的蒙古族国事活动家松筠^[101]的功绩,他在西陲供职的同时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成为下列著作的基础:

① 《伊犁总统事略》——概述西陲的总貌。它记述了平定该地域和后来安置的情况,内有许多绘制得很好的附图。据卷首的日期,其刊行时间可判断为1809年^[102]。不久(1811年)又出现了第二个版本,标题为《西陲总统事略》,除原有的24卷外,另加一分册,增补了两章新内容^[103]。

② 《钦定新疆识略》——从史地方面记述新疆,1821年刊行。该著的内容更为丰富

(10——13本)，也附绘图^[104]。它在中国是得到官方赞同的（即所说的钦定），而在西欧则因儒连^[105]和雅金夫的节录而享有盛誉^[106]。

③《镇抚事宜》——关于外藩（西藏、蒙古、东突厥斯坦）和俄国的记事。1823年刊行，4本。据瓦西里耶夫反映，该著主要部分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诗，只是涉及史地内容的附录极引人注目^[107]。

(2)《三州辑略》——西陲三州即哈密、吐鲁番与乌鲁木齐的记述。这部专著内容相当丰富，9本，1805年刊行^[108]。

(3)《新疆图考》——主要从地形方面对新疆及其军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据亚洲博物馆所藏手稿得知，该著附许多木板印刷的绘图^[109]。这些绘图在中国曾出过图册单行本，也是木板印刷，不加任何说明，取同名《新疆图考》，彼得格勒大学图书馆有存本^[110]。

(4)1823年出现一部汉学家公认的名著《西域水道记》，记述西域水系，并附历史考证。由徐松（号星伯）撰写。他在该地流放时凭自己的考察并从文献和档案中收集了珍贵的资料。计五本（也有四本的），附绘图^[111]。B. M. 乌斯片斯基、K. 希姆利沙从这部著作中摘录了大量内容^[112]。

(5)《圣武记》——满清自建朝起到道光朝中期（约指1603——1841年）的历朝皇帝御驾亲征的记述。这是满清皇朝的一部国事史，由可以接触国家档案的著名作者魏源撰写。第一版刊行时间是1844年，以后的另一些版本又作了若干修订^[113]。第三、四章专讲康熙、雍正和乾隆与卫拉特部的历次战争；在阐述平定西藏的第五章中也记述了卫拉特人的情况。许多欧洲作者都引用了这部著作，有些作者还作了大量的摘录。瓦西里耶夫、波兹德涅耶夫、库朗、M. 詹姆特尔、柔克义、E. H. 帕克尔的著作^[114]对研究卫拉特历史来说是有意义的。

(6)《皇朝藩部要略》——包括乾隆朝在内的满清时期诸藩部史要略，祁寯藻（又名祁韵士）于1846年撰成，计6本。该著根据上述藩部王公传记和《平定朔漠方略》的材料列出了年表。B. M. 乌斯片斯基和A. M. 波兹德涅耶夫在上面提到的研究论著中引用了这部著作^[115]。

(7)《西域考古录》——研究西域的古物和历史。俞浩撰，1847年成书，计10本。由翻译官A. A. 连齐译成，但译文终未出版。B. M. 乌斯片斯基引用过^[116]。

(8)《蒙古游牧记》——记述蒙古诸游牧地（也包括卫拉特的在内），张穆（号石州）撰写，他逝世后由何秋涛校补。卷首注明的年份是1859年，计4本。这是一部详尽的汇编。作者的意图是：它应成为《皇朝藩部要略》的地理补编，可是，因为补充了很丰富的历史和考古性质的注释，可以使人认为这是一部记述蒙古情况的百科全书^[117]。这部著作的长处引起了俄国汉学家的注意，其中的П. С. 波波夫把它译了出来，只是对他认为的该著记载中“不足注意或文字累赘”的地方作了删节（不一定完全客观）^[118]。早先还有过节译本，由B. П. 瓦西里耶夫及其学生A. O. 伊凡诺夫斯基和安德烈耶夫斯基完成^[119]。

汉文和汉满文对照的史料对近代的蒙文历史著作也起过重大影响。大家知道，蒙古人是以满洲人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在与卫拉特部征战中的，因而其编年史对这些事件的阐述与上述提及的史料也是相同的。此外，蒙古作者还利用了自己的档案文献，记载了许

多带地方色彩的细节。利用蒙文史料阐述卫拉特史的只有刊布《宝贝念珠》片断的波兹德涅耶夫，他在著作中就这方面内容概述了蒙古人所创著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120]。

以上指出的汉、满、蒙文史料为卫拉特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从这些史料中可見到自北京各档案馆中所摘抄的文献、碑铭、同时代人的笔记以及以原始资料为依据所写的内容扎实的研究论述。然而，原始资料涉及的是北京政府非与卫拉特部直接发生接触不可的时期，即主要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而在此之前的材料是中国人通过调查或部分自卫拉特文历史记事而得到的。这些记事我们可加以适当利用；记事本身充实了汉文历史文献的记载，也阐明了卫拉特诸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状况。穆斯林史料对这方面情况所能增添的内容相当少。

如上所述，这方面的全部资料至今仍然未加充分利用；文献原文和译文刊印的极少；多数作者局限于转述自己所摘录的资料，常常连资料来源都不指明，或是交待得极不确切（例如“译自汉文”）。系统地刊印整套专著还有待于这方面的研究者去完成^[121]。

但是，即使对上述史料中可以见到的资料进行精细的研究，卫拉特史还一定会有许多方面不是未被阐述，就是阐述得非常不足。首先是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一较早时期的情况仍是模糊不清的，而这一时期正是卫拉特人迁徙和建立卫拉特强国的时候，显得格外重要。此后的时期，在卫拉特人与蒙、满、藏以及部分穆斯林诸民族关系史方面，可见到丰富而且往往是很详尽的材料。但在这些材料中几乎很难见到卫拉特诸部与其北方和西方诸邻——乌梁海人、吉尔吉斯人、鞑靼人——关系的情况。至于俄国，虽然北京政府与它就卫拉特问题也有过交往，但是这种交往多半是偶然性的，而且只是集中于卫拉特强国衰落时期；因此，连汉文史料关于俄国与卫拉特关系的记载，价值也不大。

上面指出的空白和缺陷，许多地方可由源自俄国的史料来填补。还在卫拉特人处于涣散和政治上软弱的时候，俄国人已不得和他们接触，以后逐步看着他们渐渐强大起来，最后，又是他们迅速衰败的见证人。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俄国史料中可看到这样一些记载，它们阐明了卫拉特诸部在整个一百五十年时期内堪称是平稳的状况（而这方面情况未必不是俄国史料最珍贵的地方），同时为印证其他文献的资料提供了可能性。诚然，俄国人多数处于目睹所发生事件的旁观者的地位，因而总的说来，对卫拉特人的内情缺少细察，也就无法充分明瞭地解释卫拉特人和所有邻族的关系；不过，只要事情涉及到俄国领土以及属俄国势力范围内的各民族，俄国史料提供的资料还是极丰富的，足以勾勒出俄国与卫拉特关系的梗概，乃至勾勒出某些细尾末节。

俄国史料另一个非其他文献所能代替的特点则是，我们几乎保存了整整一个时期的文献原件，至少也保存了可以说是很陈旧的当时的抄件，因为这都是各国家机关有关卫拉特事务的官方文书的原文。

上述官方文书集中于莫斯科国中心，在地方上尤其集中。卫拉特诸部自准噶尔向北方和西方移动时，先是和西伯利亚、而后又和俄国东南部的各地官署发生直接交往；十七世纪，俄国政府机构正广泛发展文牍式官方文书，于是，在有关军政长官官署之间，它们和莫斯科之间以及和卫拉特诸首领之间的文书来往就很频繁。另一方面，与卫拉特人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所产生的反响，以各军政长官呈文的方式或卫拉特使团的形式传到

中央，进而活跃了莫斯科诸衙门之间或是它们与各地官署之间的公文来往。所有这一切给各省档案馆和中央各档案馆留下了多种多样形式和各种不同内容的大量文献。

在各地档案中较细腻地并以较为鲜明的色彩描绘了与卫拉特人各种关系的图景。与卫拉特诸部各游牧地毗邻的那些地区的军政长官们，在与卫拉特的来往和采取和平或军事性质的一般措施方面拥有特殊权力。在本文所研究的这一时期内，赖以进行卫拉特事务的主要省中心，几乎始终都是托博尔斯克城^[122]。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及自1710年起接任的西伯利亚省长，首先主持的是卫拉特诸使团的接待和放行工作，以莫斯科沙皇的名义或按他们的谕旨将俄国使臣派往卫拉特诸游牧地的也是他们。莫斯科并未直接接待和派遣过使团，因此，许多卫拉特使团尽管一再坚持要求，也未曾获准前往比托博尔斯克更远的地方。他们只是在较为重要的情况下偶尔进入莫斯科，而且每次都是得到中央政府特准的，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访使团也不是由莫斯科而是由托博尔斯克装备的。莫斯科只是发出相应的指示，并向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提出如何物色“合适人选”以完成使命。

在对卫拉特人采取防卫和一般军事措施方面，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的权能对当地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他对这方面事务的打算也要事先得到中央政府方面的赞同；但在地方上，第二等军政长官只有和托博尔斯克联系好，方能对卫拉特人采取某种攻势，他们的作用处于被动地位：他们应该是“倍加小心留守”，收集卫拉特队伍行进的消息，以免他们“骤然来至君主诸城与交实物税诸乡”，“不致造成某种不测”。卫拉特人经常迁徙，经常突然发起袭击，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略往南的各县常常处于很困难的境地^[123]。

因此，在卫拉特事务方面（其实，别的问题也是如此），西伯利亚几个次要中心的军政长官是在托博尔斯克监督下行动的，虽然他们也有权直接和莫斯科来往，但一般是让托博尔斯克同僚知道这些来往的。从莫斯科政府这方面来说，原则上虽也面向所有的军政长官，然而有时更愿意通过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转发自己的指示，尤其当这些指示不仅只对一个地点具有意义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察觉到莫斯科方面限止低级行政官员职权范围的意图，对传统习惯、给俄罗斯居民造成的困难、甚至连卫拉特人的抗议也都置之不顾。例如1646年，突然命令秋明军政长官停止与卫拉特人的一切交往，甚至是纯属贸易的交往，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明令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一如既往独自接纳”卫拉特“使臣至托博尔斯克”，“巧妙适应西伯利亚习俗，以当地惯用办法使来自秋明使团与集市之卡尔梅克人趋于平静，不得因此与彼等大肆争吵，也不得将无谓战事引至君主之西伯利亚诸城镇”。战争虽未接踵而来，但卫拉特人不愿因将出售牲畜赶往托博尔斯克而增加不必要的路程，于是造成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另一方面，当地居民的各阶层代表，也包括军役人员在内，集体呈文，对取消方便于他们的、也为他们所极端需要的卫拉特人集市一事，表示不满，但莫斯科依然故我，虽然文书来往持续了数年之久^[124]。

然而，局势往往迫使改变上述的一般程序，在不同的时期，甚至连使臣来往也不是只通过托博尔斯克，而且也通过其他地点。

第一批卫拉特使团出现于1607年：一个使团去托木斯克，另一个去塔拉，而去塔拉的使团后来又获准去莫斯科^[125]。此后，在一段时间内，塔拉城因邻近卫拉特游牧地而

在与他们的交往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在十八世纪时，塔拉又曾暂时恢复过这种作用^[127]。卫拉特使者时而在秋明城出现过。1629年，托木斯克获准不受托博尔斯克军营的约制，自然从此力求自己也能参加与卫拉特人的交往活动；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起，托木斯克这方面交往变得很活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直接受到来自卫拉特方面的袭击危险时，与托木斯克一样，有时也在交往活动中露面。二十年代*，随着卫拉特人向西移动，乌法的作用突出了，并通过它与卫拉特各部来往得很活跃，这种来往至少在开始时受到喀山军政长官的某些监督。顺便提一句，十七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著名的和硕特王公阿巴赖台吉对乌法十分向往。在相当早的时候，即自三十年代起，阿斯特拉罕也出现在舞台上，很快就一手独揽了与如下一部分卫拉特人的交往活动：他们是被称之为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为人们所熟悉的，主要由土尔扈特人组成。

彼得大帝在位初期，在指导西伯利亚各城市（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所下达的诸训令条文中^[128]，特别在颁布1695年4月24日有关此事的特别谕旨后^[129]，与卫拉特人的种种关系也受到了注意。军政长官在军事措施方面所规定的权力的提法几乎都是相同的：对军政长官一概规定“不得”与卡尔梅克人“肇事”，然若他们自己来挑起战争，情况又很令人担忧，则可根据当地情况“采取对策，但求慈祥的上帝保佑之”；这方面情况，托博尔斯克（托博尔斯克军营）属下的军政长官应向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报告，而其余的军政长官则应向莫斯科报告。至于使节来往，只在致托博尔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军政长官的训令中才有这方面的条文：他们被授命接待卫拉特使臣和就地答复问题，不让使臣去莫斯科；他们还被授命接下致君主的书信，在当地翻译后，连同译件一起转送至莫斯科。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卫拉特事务的经管程序有所变化。1744年，西伯利亚设立了司令之职，指挥分布在卫拉特领地边界的军队；而且，除纯属军务的职能外，司令还负有使命经管边区和在那里发生的与卫拉特人交往有关的事务，有权与中央直接来往。然而，对待卫拉特的总政策仍掌握在西伯利亚省长手上，从这时起，中央开始从两种文献资料得知卫拉特人事务的进展情况。外交部莫斯科档案总馆存有两整套来自西伯利亚的报告，属卫拉特处于危机的时期（1745—1758年），每年的报告都依次保存无缺：一套报告来自西伯利亚省长和西伯利亚省办公厅；另一套来自指挥军队的司令。第一任司令是金杰尔曼少将，1752年死于职守，他的继承人克拉夫特准将自1752年起接任，1756年起——里德杰尔少将，1757年起——弗劳恩多夫准将。军队司令所在地多半是在托博尔斯克。司令属下的军事一行军办公厅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后转移到鄂木斯克，1857年这些档案又为Г·Н·波塔宁找到^[130]。

1744年，随着奥伦堡省的建立，有些卫拉特事务又要通过作为吉尔吉斯草原的管理中心——奥伦堡进行，因为吉尔吉斯人**和卫拉特人经常发生冲突。

与卫拉特交往的整幅图景是千变万化的，这表现在当事人栩栩如生的形象方面，表现在以上列举的西伯利亚诸城及与西伯利亚接壤的地方的档案中，甚至在象韦尔霍图里

* 指十七世纪。——译者

** 即所说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译者